

# 2021

##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PAP 研究报告

### 2021 Global Educational Think Tank Influence Evaluation PAP Report

长江教育研究院 | 方略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quareStrategics Research Institute

---

# 2021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研究报告

长江教育研究院 | 方略研究院

---

# 目录

一、引言.....	1
二、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研究背景.....	2
三、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3
(一) 决策 (POLITICAL) 影响力.....	5
(二) 学术 (ACADEMIC) 影响力.....	6
(三) 大众 (PUBLIC) 影响力.....	8
四、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结果.....	10
(一) 全球教育智库名单的确认.....	10
(二)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结果.....	16
(三)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分析.....	16
(四)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局限性.....	18
五、提升我国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20
六、结语.....	23
附录.....	24
长江教育研究院.....	24
方略研究院.....	25

---

# 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推动理论、实践、制度和他文化层面“创新”的重要论述。在以数据化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全球突发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面对国内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转型问题，“创新”不仅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愈发凸显，关乎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也关乎到我国是否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脱颖而出，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愿景。而智库作为凝聚社会智慧与力量的重要平台，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智力资源，而且在国际上还代表国家的软实力，是国家“二轨外交”<sup>1</sup>的重要媒介，在全球合作与交流中，为传播中国的思想理念、塑造国家形象、获取国际话语权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各类智库当中，教育智库是凝聚人才、驱动创新、在教育领域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国在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教育治理格局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参与力量，更是实现我国2035年教育现代化、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并最终由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长远目标<sup>2</sup>的重要推手。教育是强国之本，也因此使得教育智库成为了化解错综复杂的国内教育与社会问题、增强国家教育竞争力、提升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及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教育智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决定了其需要具备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关乎教育大计创新性咨询与服务的关键能力，鉴于此，我国教育智库需要不断地进行自身创新性建设。而实现创新的前提就是需要明晰国内教育智库与国外领先教育智库之间的差距，以便找到可以学习、借鉴的标杆和榜样，选择性地借鉴国外领先教育智库的经验。为有效衡量全球教育智库的建设成果，帮助国家总体把握教育智库发展态势，促进各教育智库找准位置发现不足，向社会各界展示教育智库的形象和实力，践行教育研究的全球智库——方略研究院于2019年起联合长江教育研究院组建全球教育智库评价课题组，对全球教育智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智库等展开评价研究。本报告是课题组第3份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PAP）年度报告。

---

<sup>1</sup> 付睿,周洪宇. 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与新时代教育智库转型发展[J]. 世界教育信息. 2021 (1): 9.

<sup>2</sup>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我国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

---

## 二、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研究背景

教育智库主要指有关专业人士开展公共教育政策研究以便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咨询和服务的机构。从世界范围来看，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教育智库便开始在世界各地兴起，其中，美国教育智库在功能、数量、种类方面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美国智库起步于 20 世纪初期，最初致力于公共政策的研究。随着智库数量和功能的不断发展、完善，教育智库在美国应运而生。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美国教育智库开始进入萌芽时期。1957 年，随着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苏联科技一度超越美国，引发美国高层人士对教育落后导致科技落后的强烈反思，政府因此开始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先后出台了各种促进性政策措施<sup>3</sup>。除此之外，20 世纪中期的“反贫困战争”促使智库的研究重心向关注国内政策转移，尤其是 1983 年《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报告发布后，美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教育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关注教育政策领域的智库也由此大幅增长<sup>4</sup>。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教育智库为国家提供制定教育政策的方案、评估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推动教育政策辩论等已经成为教育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中国，教育智库建设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及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手段。自 2015 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颁布以来，我国智库建设进入新时代，各类智库不断涌现。这其中，教育智库作为完善我国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关键主体，其建设更加离不开高质量的创新。一方面，任何创新都要有创造性思维，而教育智库就要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启迪者、引导者，根据教育的现实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使得其研究成果能够有效转化为政府决策。另一方面，在新闻媒体时代，舆论环境变得多元复杂，舆论的传播途径也变得多样。这就使得一些非理性声音，如谣言、虚假信息等通过个人、群体、大众传播的混合模式迅速被放大，甚至产生聚变，形成舆论洪流。这就需要教育智库具备对教育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能力，营造良好的教育舆论环境，并充分运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来引起

---

<sup>3</sup> 李清刚. 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演变及特点[J]. 教育学术月刊, 2017(02): 27-32+75.

<sup>4</sup> 赵章靖, 邢欢. 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过程、趋势与特征[J]. 世界教育信息, 2016, 29(04): 5-11.

---

社会对于一些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的关注和反应，最终影响和推动教改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借用求是杂志社《红旗文摘》副总编孙广远的形象比喻，教育智库要形成广泛的影响力，需要伸出它的“天线”和“地线”：“天线”是让自己的思想成果往上去，以求影响决策；“地线”是让自己的思想成果往下走，以求影响舆论<sup>5</sup>。随着我国教育智库的不断发展，如何培育特色新型教育智库，使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上达政策，下达民众，成为当下我国教育智库的又一发展目标，也是本课题组所理解的我国教育智库“特”与“新”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全球教育智库评价有助于国家总体把握教育智库发展的形势，有针对性地出台支持智库发展的政策；对于智库而言，智库评价不仅有助于智库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建立，还有助于智库之间在竞争、学习中发现不足，激发智库持续发展的动力；对于基金会、媒体、学术界、社会大众而言，智库评价有助于展示智库行业和个体的公共形象。

为有效衡量全球教育智库的建设成果，帮助国家总体把握教育智库发展态势，促进各教育智库找准位置发现不足，向社会各界展示教育智库的形象和实力，践行教育研究的全球智库——方略研究院联合长江教育研究院组建全球教育智库评价课题组，对全球教育智库展开评价研究。

### 三、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由我国教育智库研制具有全球视野的教育智库评价，既是在全球教育智库评价中发出中国教育智库声音的重要方式，也是审视中国教育智库发展现状、明晰国内教育智库与国际领先教育智库之间差距，进而找到可供学习、借鉴标杆和榜样的重要举措。但如何构建国际、国内可比，且能恰当反映智库水平的指标体系，仍是本研究的难点和重点。

课题组经过梳理发现，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评价中心联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发布的《MRPA 测评报告》、长江教育研究院、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评价中心（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联合南京晓庄学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智库评价 SAFI 研究报告》等智库评价，均将影响力作为评价智库的核心指标之一。

---

<sup>5</sup> 刘慧婵, 耿丹青等. 新媒体环境下教育智库舆论引导功能的发挥. 教育评论. 2019(7): 16.

从某种程度上说，影响力既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评价智库的重要指标之一，甚至可以说已成为智库评价最为核心、应用也最为广泛的指标之一。作为一个政治学基本概念，影响力属于“软性”权力的一种，同时也是不同于“控制力、力量、强迫和干涉”的一种权力的特殊形式<sup>6</sup>。它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和‘潜移默化’的行为来达到影响别人决策的目的”<sup>7</sup>。在思想竞争自由的市场上，智库的成功不是以利润的多少来衡量，而是取决于产生了多少影响力，其影响力的核心就在于“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使政策过程或政策决策者的观点发生改变”<sup>8</sup>，最终推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根据学者加尔东（Johan Galtung）的理论，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各阶层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将社会结构分成三个层次，即决策核心（decision-making nuclear, DN）、政策中心（center）和政策边缘（periphery），如图1所示。其中，智库就属于政策中心层范畴，面对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参与者，智库内的研究院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并通过与决策核心层、中心层和边缘层等三个层次中的各个参与者进行互动，进入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发挥出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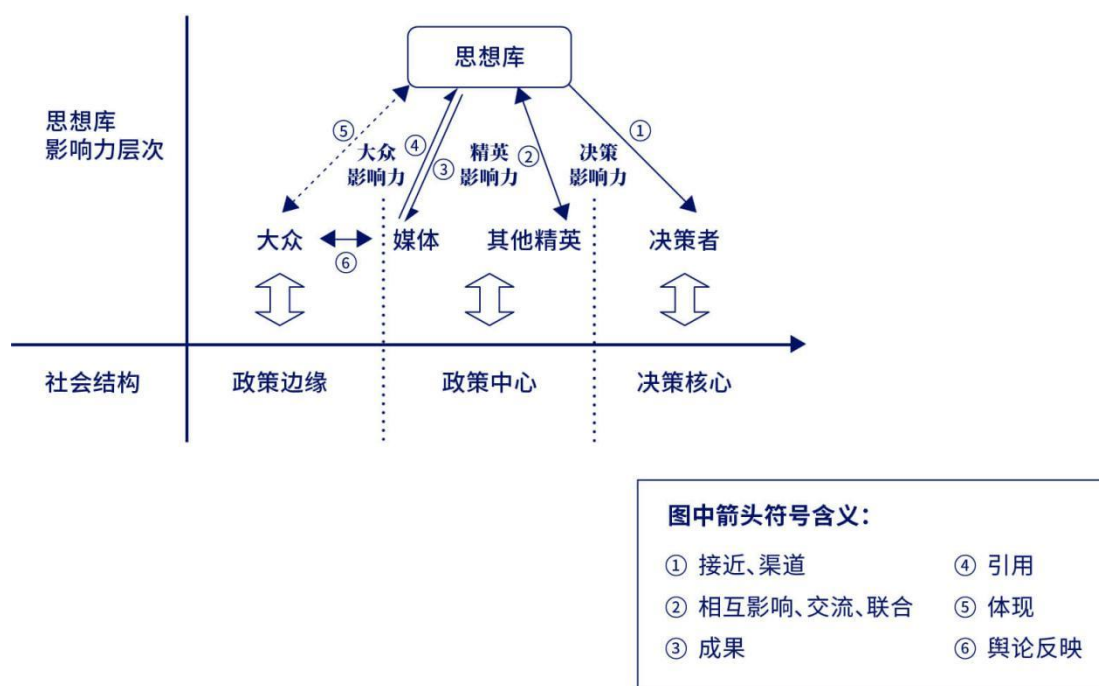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结构与思想库影响力（根据加尔东理论框架重新制图）

<sup>6</sup> 朱旭峰, 苏钰. 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构建.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12): 23.

<sup>7</sup> Ibid.

<sup>8</sup> 王桂侠, 万劲波. 基于政策过程的智库影响力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11): 151-157.

---

鉴于此，课题组以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从决策影响力（political influence）、学术影响力（academic influence）和大众影响力（public influence）等三个层次（三个维度的英文首字母连在一起，即组成“PAP”）对全球教育智库进行评价研究。

## （一）决策（Political）影响力

决策影响力是指智库专家参与政策导向、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或政策评估，为决策者提供专家意见、辅助决策的能力。智库通过委托研究、国会活动、政府决策顾问等方式，与政策决策机构之间建立起正规或非正规的沟通渠道，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供给决策者，使其愿意抽出时间来关注其研究成果，并最终采纳其建议<sup>9</sup>。这是思想库为了试图影响政策所采取的最直接的方法。然而，评估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具有相当难度。每个国家或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是一个经过众多利益相关者商讨、博弈的复杂过程，且极少有政府会将特定政策的推行明确归功于某一智库，因而很难明确单一智库的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为克服难以直接衡量智库建议是否直接推动某项政策的困难，课题组以智库与政府及决策者的关系作为二级指标，衡量全球教育智库的决策影响力。由于高层领导们工作繁忙，几乎没有阅读时间，因此如果智库仅以学术研究姿态，就论文与其沟通，显然是无效的，最好的方法是在小型会议上亲自向领导呈上言简意赅的研究成果，而这取决于智库能否通过其卓越的人脉关系接触到领导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智库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其决策影响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人际网络在美国的政治机制中就尤为重要。在美国，每隔4年很多卸任的官员都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流通的“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得以直接与政府决策者进行沟通，从而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该学会现任200余名研究员中，约1/2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担任过驻外大使的就有6位之多。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加入奥巴马政府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有36人之多。这种人际

---

<sup>9</sup> 朱旭峰, 苏钰. 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构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12): 24.



---

关系网络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建议可以迅速到达白宫、国会和政府各个机构，从而对政策制定产生直接影响<sup>10</sup>。

由于政治体制、基本国情的不同，“旋转门”机制在我国实行较为有限，毕竟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旋转门”制度植根于西方的选举文化和两党轮流执政的特殊环境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智库与政府部分人员之间的这种双向流动使西方智库成为了“在野党的人才储备库。”<sup>11</sup> 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参政党都“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中国智库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党和国家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建议，而不是为某个政党的利益服务。”<sup>12</sup> 因此衡量和评价我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比如，虽然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旋转门”机制，但在国内也已出现了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才流动现象。特别是隶属于我国党政机关的官方教育智库，凭借自身独特地位，与教育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接触机会多，成果上呈通道顺畅，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多<sup>13</sup>。除此之外，部分高校和民间教育智库的职员也在政府中具有相当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政府高层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也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卸任的高级官员。因此，以智库与政府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衡量智库决策影响力的二级指标，不仅适用于中外智库的现状，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便于收集到相对客观的数据。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以“核心成员曾任或兼任国家/联邦级或省部/州政府官员等级”作为三级指标，同时考察智库获得内参、批示和承担政府课题的数量，辅以智库发布的具有高影响力、特别是有国际影响力和政策参考效果的报告，来综合判断全球教育智库的决策影响力。

## （二）学术（Academic）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是指智库机构或专家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现给同行及其他社会精英的能力。学术影响力是智库综合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深厚的学术能力和知识积淀作

---

<sup>10</sup> 王莉丽. 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J]. 国际问题研究. 2010(02): 14.

<sup>11</sup> 付睿, 周洪宇. 习近平推进创新重要论述与新时代教育智库转型发展[J]. 世界教育信息. 2021(1): 9.

<sup>12</sup> Ibid.

<sup>13</sup> 周洪宇. 智库的转型[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6. 11.

---

为根基，智库才得以有源源不断的养分为现实政策出谋划策。正如陈媛媛所言：“智库要提供思想和智慧，需要有潜心的学术研究，才会有创新的思想 and 解决问题的智慧；解决当前的政策决策不能仅仅从当前社会问题出发，还要结合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来决策，通过学者的研究，历史可以昭示现实，从而避免决策者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sup>14</sup> 从现实意义来看，智库如果能够说服其他社会精英赞同并支持自己的政策观点，同时能够联合其他智库和研究机构一起倡导自己的学术主张，那么其政策观点也更容易成为中心阶层的主流观点，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核心。

课题组从论文、研讨会和连续出版物等三个层面来评估全球教育智库的学术影响力。首先，论文指标选取的是近三年署名为该教育智库的论文篇均被引次数。之所以采用三年为限的标准，是因为学术类出版物介入社会并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且相对隐性的过程。不仅如此，人们阅读或调研学术出版物的习惯跟追踪新闻热点不同，一般来说也具有延迟性。而鉴于做科研对于文献资料数量且覆盖面的要求，通常情况下也要调研相关领域至少前三年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所以此项数据采集采用的是三年为限的标准。而采用学术引用量为指标是因为学术引用量越高，越能说明智库发表的论文所得到的来自其他学者及机构的认可度越高，证明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引用量越高也意味着该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机会越大，可能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力越强。

其次，课题组选取研讨会作为衡量教育智库学术影响力指标之一的原因在于，研讨会多由专业人士参加，受众面更窄，学术认可度也更强，能够反映出举办研讨会的智库在专业领域的活跃度与学术认可度，从而体现出该智库的学术影响力。而与论文引用量指标不同的是，此项指标采用了最近一年的时间期限，原因在于论坛或研讨会的召开具有及时性和当下性，每年每场所讨论的话题一般都是当下的热点话题，所以以统计最近一年的会议召开数量为标准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可以追踪此类讨论数量每年的升降情况，以判断各个智库的学术活跃度和对热点问题的反应速度与激烈程度。

---

<sup>14</sup> 陈媛媛. 智库学术影响力评价研究[J]. 图书馆论坛. 2017, 37(12): 60.

而选取连续出版物作为评估教育智库学术影响力指标之一的原因在于，是否拥有连续出版物可以反映智库在学术成果方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过，课题组在此处仅会对智库连续出版物进行量化评估，不对其出版物的优劣进行评价<sup>15</sup>。

### （三）大众（Public）影响力

大众影响力是指智库在与媒体及公众的互动中影响大众对某一政策的看法，扩大智库政策宣传舆论影响力的能力。有学者曾专门探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社交媒体影响力的成因<sup>16</sup>，发现布鲁金斯学会尤其注重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政府、公众进行信息沟通，建立了官方网站、博客、播客，并在主要社交媒体 Facebook、Twitter、YouTube 上开设账号进行信息发布，更新速度也较为迅速，且善于将专业研究报告术语转化成通俗易懂的社交媒体语言，从而实现社交媒体信息发布的专职化和专业化。由此可见，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平台，是智库提升自身大众影响力、塑造舆论影响力的有力手段，对其引导和影响政府、公众对议题的深度认知，推动议题建构具有一定价值。

根据网络传播平台的不同，课题组将大众影响力分为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官方网站等三个二级指标。搜索引擎指标指的是在百度、谷歌（Google）两个中外主要搜索引擎上某一教育智库全称或简称的搜索量。社交媒体关注量指标关注教育智库在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粉丝数：针对国外教育智库，考察的是智库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上的官方账号的粉丝总数；针对国内智库，则考察其官方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总数。官方网站二级指标则是通过考察相关教育智库网站的 Alexa 全球和地区排名来进行衡量。

综上所述，课题组在参考已有智库榜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研讨、实践，确定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的指标体系。具体如下表所示。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观测值）	数据来源

<sup>15</sup> 费雷德·昆斯, 刘柯兰, 冯胜, 郑吟秋. 智库的传播与影响力指标[J]. 决策与信息. 2016(08): 98.

<sup>16</sup> 相德宝. 新媒体时代全球智库社交网络影响力探析[A].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18 年度）[C].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18: 589.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观测值）	数据来源
决策影响力	与政府及决策者关系 （旋转门经历）、内参、 承担课题、政策影响力 等		教育智库官 网、专家打分
学术影响力	论文	近三年署名为该教育 智库的论文篇均被引 数	微软学术 （Microsoft Academic）、 中国知网 （CNKI）
	研讨会	近一年召开研讨会数 量	智库网站报道
	连续出版物	是否有连续出版物	智库网站报道
大众影响力	搜索引擎	教育智库全称/简称 的 Google 搜索量	Google Ads
		教育智库全称/简称 的百度搜索量	百度推广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影响力和关 注度	脸书 （facebook）， 推特 （twitter）， 微博，微信

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观测值）	数据来源
	官方网站	独立网站的官网流量 (独立一级域名)	Alexa 全球排名，地区排名

## 四、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结果

### （一）全球教育智库名单的确认

本研究中的教育智库包括国际智库名单、国外智库名单和国内智库名单。

**国际智库**名单来自于代表性国际组织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能局等，共计 5 家。

**国外智库**名单参考了 2019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排名（*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专项排名——Top Education Policy Think Tanks、2017 年清华大学智库大数据报告等国际智库的榜单报告以及各国官办国家级教育研究机构。课题组从中遴选出涵盖主要国家并以教育为主要研究领域或有专门教育研究团队的教育智库共计 61 家。

**国内智库**名单主要来源于国内各大智库排名和研究报告（南京大学 2015-2016 和 2018、上海社科院、清华大数据、浙大、周洪宇和刘大伟《中国教育智库评价 SFAI 研究报告（2019 版）》）中出现的教育智库。课题组最终遴选出代表性教育智库共计 14 家。

2021 年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 (PAP) 结果		
排名	机构	地区
1	美国城市研究所	国外
2	美国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	国外
3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国外
4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	国际
5	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国外
6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国外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	国际
8	美国卡托研究所	国外
9	美国 SRI 国际公司教育政策中心	国外
10	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	国外
1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能局	国际
12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国外
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	国际
14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分析中心	国外

15	法国国家高等教育战略委员会	国外
16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	国外
17	美国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	国外
18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国内
19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国外
20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国外
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	国际
22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国内
23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国外
24	美国教育信托基金会	国外
25	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价中心	国外
26	美国教育政策与数据中心	国外
27	印度国家教育规划与管理研究所	国外
2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内
29	土耳其教育改革倡议	国外
30	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国外
31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国内

32	哈佛大学全球教育创新中心（研究生院）	国外
33	韩国教育开发院	国外
34	克罗地亚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	国外
35	芬兰教育研究协会	国外
36	新西兰教育研究委员会	国外
37	英国教育政策研究所	国外
38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国内
39	美国国家教育政策中心	国外
40	美国国家教育与经济中心	国外
41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国内
42	塞尔维亚教育政策中心	国外
43	芬兰教育研究院	国外
44	荷兰 SOCIRES	国外
45	斯洛文尼亚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国外
46	格鲁吉亚国际教育政策、规划和管理研究所	国外
47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	国外
48	亚美尼亚教育和培训部	国外



49	俄罗斯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现教育管理学院）	国外
50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	国内
51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国内
52	匈牙利教育政策分析中心	国外
53	阿塞拜疆教育创新中心	国外
54	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	国外
55	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育中心	国外
56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国家学习成果评估所	国外
57	美国国家教育评估改进中心	国外
58	立陶宛教育策略中心	国外
59	弗吉尼亚大学柯里分校教育政策和劳动力竞争中心	国外
60	乌克兰教育研究中心	国外
61	布朗大学安纳伯格学校改革研究所	国外
62	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国内
63	爱沙尼亚政策研究实践中心	国外
64	伊曼尼(IMANI)政策教育中心	国外
65	乌克兰国家教育科学院	国外

66	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	国内
67	德国科学审议委员会	国外
68	英国教育基金会	国外
69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内
70	美国赫金杰教育与媒体研究所	国外
71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	国内
72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教育高级研究中心	国外
73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内
74	英国教育捐赠基金会	国外
75	美国创新教育研究所	国外
76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国内
77	马其顿公民教育中心	国外
78	阿尔巴尼亚民主教育中心	国外
79	吉尔吉斯斯坦教育倡议支持基金会	国外
80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	国外
注：相关数据收集、整理截至 2021 年 10 月		

---

## （二）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结果

与 2020 年评价结果相比，美国教育智库的影响力依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全球排名前 10 的教育智库中，共有 8 家来自美国，其中位列前三名的分别是美国城市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一些国际教育智库的排名有所下降，虽然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继续维持在全球前 10 名的范围内，但与去年相比，前者由去年的第 2 名掉到了第 4 名。而去年排名第 6 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能局今年则掉落到了第 11 名。全球前 10 名教育智库的位次与去年相比也有所调整，维持位次不变的仅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这一家国际教育智库（第 7 名）。

14 家国内教育智库也在影响力方面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上升势头。与 2020 年评价结果相比，仅有 3 家国内教育智库的排名有所下滑：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由去年的第 69 滑落到了 71；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由去年的 71 滑落到 76；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相对来说下滑较多，由去年的 30 滑落到 51，而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刘海峰教授在内的多位该智库主力人才或调离到外校或退休并到他处任职，使得该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受到较大冲击。有 5 家国内教育智库的排名与去年持平，有 6 家国内教育智库的排名都有所上升。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继去年排名大幅度提升、成功入围全球前 20 强之后，今年仍然保持着第 18 名的良好成绩。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也保持在全球第 22 名。这两家入围世界领先智库的智库位列在国内教育智库排名的前两名，而排在国内教育智库第 3 名的则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较去年继续维持在全球第 28 名。

## （三）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分析

从决策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国际和国内教育智库中均存在智库领导人与政府官员之间相互流动的情况，但相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教育智库的“旋转门”机制，我国教育智库虽然也存在个别由行政人员转至教育智库的案例，如山东省教育厅原一级巡视员张志勇选择到高校工作，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

---

究院执行院长；受教育部党组安排，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原副司长彭斌柏转岗至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出任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但总的来说，由于前文所论述的我国的特有国情和政体，由教育智库转至政府部门的案例十分罕见，不及美国教育智库频繁。另外，除了旋转门机制，国际知名教育智库还曾发布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告，推动本国乃至世界层面的政策制定与推行，如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确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大学排名、教育立法、政府决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比之下，大部分国内教育智库虽积极为政策建言，发布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报告，但总的来说在影响力上仍有所欠缺。

从学术影响力的角度来看，英国教育政策研究所、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和美国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是近三年发表论文数前三位的国外教育智库，同时也是近三年被引数最高的三个国外教育智库；其中，英国教育政策研究所在此项排名上超越了去年排名第3的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和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是篇均被引数前三位的国际和国外教育智库。

跟去年相比，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仍然是近三年发表论文数最多的三家国内教育智库；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是近三年论文被引数排名前三的国内教育智库。值得注意的是，在篇均被引指标下今年排名前三位的国内智库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研究院取代了去年排名第1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而排名第3的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则取代了去年排名第3的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总的来说，在发文量上国内教育智库与国外教育智库差异不大，但在引用量上尚有较大差异，相较而言，14家上榜国内教育智库的篇均引用量与国际优秀教育智库之间还存在差距。

从大众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国际和国内教育智库在社交媒体影响力上的表现存在明显差距。国外教育智库比较重视社交媒体的力量，基本每个智库都有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账号，且账号基本上很容易在官网被找到。

---

而 14 家上榜的国内教育智库少有将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和官网全部开通的情况，仅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既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也建立了官网。相对而言，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开设情况稍好些，共有 9 家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但仅有 5 家国内教育智库开通了官方微博账号。另外，虽然有几家国内教育智库开通了自己的官网，但仍然存在信息更新不及时，官网维护不足等情况，甚至有的教育智库连官网都一直未曾开通，结果造成各大国内教育智库未能通过官网这一自营渠道及时将自身形象展现给公众，大大降低了教育信息和话题到达大众的效率，也自然影响了大众影响力发挥其作用。相比之下，国内民间教育智库更加注重大众影响力的辐射作用，其微信或微博的开通率和粉丝数都要高于其他国内教育智库，如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微信和微博的粉丝量得分均较为靠前。

#### （四）全球教育智库影响力评价的局限性

正如前文所述，智库的最终目标是影响政策的产出，而政策是由决策者制定的，也就是说，智库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对政策决策者及其政策观点产生影响上。作为从心理上促成对方改变想法的力量，影响力很难被具体指标所量化，这在决策影响力评估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在调研时发现有些智库如上海社科院、南京大学、四川省科院会采用“专家评议”的方式来评估智库的决策影响力，这种方式虽然较为直观地体现出各智库在业内权威人士心中的影响力，但却无法避免打分专家的主观性。本报告在专家打分之外，同时采取了智库人员旋转门经历和内参、批示、承接课题数量为指标，希望力图科学评价智库决策影响力，但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力难以量化、数据匮乏、评判主观性等问题的制约。

其次，在学术影响力评估方面，虽然课题组通过在微软学术（Microsoft Academic）和中国知网（CNKI）平台上检索近三年署名为相关教育智库的论文被

---

引总数和论文发表总数，可以实现量化评估，但这种统计数据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统计到的具体论文数据受制于这两个数据库的完备情况，可能有所疏漏，另一方面，也只检索了以英文或中文发表的论文，未检索以其他语言发表的文章，不排除有部分智库的论文成果由于使用不同语种写作和发表等因素而被遗漏统计的情况。而关于研讨会和连续出版物的统计，一方面，该项数据是课题组根据智库网站报道进行人工统计而得，可能有所遗漏；另一方面，过去一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线下研讨会或取消或改为线上或采用其他形式进行，以至于本课题组较往年更难追踪和提取到准确的数据来判断各个智库对于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及通过召开论坛的方式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力。此外，由于难以从质量上对智库研讨会和连续出版物进行评判，课题组只关注数量，此举存在一定局限性。

最后，在大众影响力评估方面，一方面，针对国内智库的数据统计不排除部分教育智库的官方微博或微信账号不以其智库全称或简称形式存在，因而可能导致课题组统计数据时出现遗漏。另一方面，在自媒体高度发达、新的传播媒介不断涌现的时代，除了微信和微博以外，各大短视频分享和直播平台也在不断地侵蚀和挤占着微信微博或传统传播媒介的信息空间。国内究竟利用哪种流行媒介对大众进行信息传播、知识普及、或舆论引导最为有效，以及哪类媒介是当今社会大众影响力的最重要载体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而这些新的因素也为本课题组未来与时俱进地进行指标体系更新和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针对国外和国际智库，课题组在进行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粉丝数量的数据爬取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如国外网站可及性（accessibility）与稳定性（stability）等问题；而通过 Alexa 全球和地区排名统计智库官网流量只能统计到一级域名，无法统计到二级域名。这些都有可能部分国外和国际智库的相关流量数据出现遗漏或不够精确的情况。

但即便可能出现数据采集不够精确的情况，本课题组仍然想要指出，基于大数据采集和研究所做出的指标体系与排名结果仍然具备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考虑到大数据治理对于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对于研究方式的创新性，本课题组认为基于大数据进行智库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且也符合当今社会

---

对于人类思维方式转型的基本要求。毕竟大数据不仅仅是一种资源和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在教育领域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虽然大数据是庞大、多元的，但其核心就是“通过在复杂事物和抽象数据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以处理数据的趋势和走向。”<sup>17</sup> 换言之，人们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需要“关注更多的不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注重的不是精确度，而是掌握大体发展方向；不再盯紧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教育智库借助大数据思维，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最终推动政府决策由过去的经验型、估计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最终实现政府决策机制再造。”<sup>18</sup>

## 五、提升我国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制度是一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作为参与教育治理的主体之一，教育智库需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斡旋，一方面搭建好政府与大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在影响力上做到学术影响力向政策的有效转化，起到上达政府影响决策、下达百姓影响舆论的作用。总之，教育智库需以智力资源服务和影响重大战略决策为其根本旨趣，也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想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加强自身的影响力建设。而不管是提升国内教育智库的决策影响力，还是提升其学术影响力，抑或是提升其大众影响力，基本出发点均应从提升国内教育智库的产出入手，因为如果不加强源头建设，将过多精力投入到渠道建设，就是舍本求末。

当前，我国教育智库的成果存在以下值得改进之处：一是不少教育智库是高校研究机构伴随“智库热”临时转型而成，成果范式仍以学术研究为主，而未完全转型成功，因此无法产出很多适合政府部门需求的政策研究；二是政府部门希望教育智库产出以数据为支撑的研究成果，以便为他们的决策提供科学且有效的支持，但我国教育智库的实证研究水平仍需加强，特别是缺乏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成果；三是政府部门所提出的政策研究需求是基于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导向，一些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难以依靠单一学科理论予以解答。理想情况下，如能围

---

<sup>17</sup> 郭军,张涛. 大数据时代下的教育智库: 特质、责任与未来.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102.

<sup>18</sup> Ibid.

---

绕相关问题展开跨学科研究，所产出的研究成果将更能满足政府部门的决策需求。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国内教育智库的研究团队主要还是以教育学科背景为主，缺乏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虽然已有部分教育智库通过采取聘请专、兼职人员相结合的方式，试图解决研究团队跨学科色彩不足的问题，但受制于经费、考评等因素影响，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建议：一是从考评机制入手，支持获得一定级别领导肯定性批示或在启迪民智方面有突出成绩的政策研究成果也能纳入智库研究人员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审体系中，但要注意的是，也不能“唯批示”、“唯阅读量”，而要在同行评审的大框架下，科学、公正评价智库研究人员的政策研究成果的质量，避免造成新的不公平。二是从人才培养环节入手，注重招收来自其它学科的学生，将他们培养成为实证研究训练扎实、有志于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教育智库后备力量，在这方面，本就隶属于高校、又拥有研究生招生培养资格的教育智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能充分结合大数据治理时代的新特征与新要求有意识地培养人才的数据思维和科学实证的研究习惯，则可有效帮助传统教育智库由理性思辨为主向科学实证（量化数据）为主的技术路径转向。三是从团队建设入手，在组建教育智库研究团队的过程中，注重提升团队的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色彩，一方面，可以在招聘时对于具有以上背景的候选人有所倾斜，另一方面，有条件的教育智库可以依托学校主要领导牵头，将教育智库和基于不同学科背景、具备实证研究优势的其它智库组成“智库共同体”，开展协同创新研究。毕竟，根据德韦兹（Medvetz, T.）的理论，智库应是由跨学科领域的精英组成的、专门服务和影响国家重大决策的国之重器<sup>19</sup>。此外，依据布迪厄（Bourdieu, P.）的“社会空间”与“权力场域”概念，智库是一种“由政治场域、学术场域、媒体场域、市场经济场域交汇而成的交叉性、整合性社会空间结构和边际组织，它既具有独立性，又保持着与其四个母体场域的联结。”<sup>20</sup>在此基础上，本课题组提出，新型教育智库研究应采取由传统学术场域向实践问题场域的空间路径转向，通过持续不断地与其母体场域间的张力与博弈生成具有跨学科属性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应用型的政策建议。

---

<sup>19</sup> 韩玉梅, 宋乃庆. 新型教育智库的组织形态和研究路径. 教育研究. 2019(3): 146.

<sup>20</sup> Ibid.



---

另外，在提升教育智库产出的同时，本课题组还针对智库影响力的三个层次提出了以下建议：首先，要想提升我国教育智库决策影响力，关键在于改变部分政府部门等“用库者”对于教育智库的态度，让他们重视起教育智库对于教育科学决策的重要价值。为此，我们建议：一方面，教育智库专家可以充分利用给各地政府部门培训、交流、座谈等机会，向他们宣传、推广教育智库的形象，普及教育智库之于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应鼓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平时工作中加强与教育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特别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理应在依托教育智库科学制定具体教育政策方面发挥出示范带头作用，为下一级教育行政部门作好榜样。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将原来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所拥有的教育管理权力分解和转移给参与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以充分发挥教育智库作为政府“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

其次，根据我国教育智库的当前实际，由于不少教育智库均为高校研究机构转型而来，其基本范式仍是学术研究，所以在三个影响力之中，如何提升学术影响力应是最不值得我国教育智库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但现在我国教育智库仍需要重视提升自身学术影响力。一方面，需要如前文所述，提升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色彩，另一方面，则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借助提升学术影响力，扩大海外朋友圈，提升我国教育智库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为实施公共外交，加强中外交流，输出中国智慧和声音，树立中国在全球教育的话语权，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属于中国教育智库的应有贡献，在此方面，可以考虑的对策包括鼓励智库研究人员加强在海外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与国外教育智库通过联合举办研讨会、互访交流、联合科研攻关等形式加强合作交流。

最后，大众影响力也是我国教育智库影响力建设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目前，国内多数教育智库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咨政”层面，而较少顾及到“启民”的层面，这背后既有主观原因，也受客观因素的制约，集中反映在教育智库的对外传播渠道存在渠道建设不健全、重建设轻运营、表达方式不受关键受众群体欢迎等问题。对此，我们建议，我国教育智库可考虑从自有渠道和合作渠道分别入手，提升大众影响力。在自有渠道建设运营方面，我国教育智库需要首先确保搭建、运营好自身官网，如有条件，还可以建设英文网站；其次，应适应媒体发展潮流，在建设、运营好以图文内容为主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的基础上，积极拓展自身在

---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传播阵地建设工作；最后，可借鉴一些国外教育智库的经验，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公众进行分层化运营，将一部分关键受众发展为订阅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向其定期发送邮件，推介智库研究成果。而在合作渠道建设运营方面，我国教育智库一方面可考虑加强与广播、电视媒体及新媒体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主动和媒体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在重大政策发布、应急事件处理等关键时刻，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在媒体发表文章等方式，主动引导舆论。

## 六、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后涌现的“智库+”理念催生出“智库+学校”、“智库+媒体”、“智库+行业”、“智库+社会”等协同创新与合作联盟形式，造就了智库研究模式的新转向和新趋势，促使智库进一步地突破政策研究与政策过程间封闭的二元关系，走向多元联动与开放共享的未来。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我国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的长远目标更是将教育智库定位为完善我国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关键主体。近些年，智库相关研究蓬勃开展，我国智库进入史上最佳发展机遇期。本报告选取80家国内外智库，从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等三个层次综合评估其影响力。评价结果显示，和国外知名教育智库相比，我国教育智库在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通过系统、科学的评价反馈，国内智库可以学习国际知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反思自身短板，从而更加稳健地推进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也可以参考课题组关于如何提升教育智库影响力的若干建议。总的来说，中国教育智库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教育现代化的加快推进，中国教育智库必将不断提高自身的咨询与服务能力，围绕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开展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政策研究，在国内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出更大影响力，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重要支撑，在国际舞台上源源不断地为教育事业奉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

# 附录

## 长江教育研究院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 2006 年 12 月 16 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众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知名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十三余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贡献力量。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 MRPA 测评综合排名全国第三，MRPA 资源效能测评全国第一。2017 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 年度中国核心智库”。2018 年在中国智库索引社会智库类 PAI 值评分榜全国第二。目前，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在按照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战略合作，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力争把自身打造成国内外一流的智库。

---

## 方略研究院

方略研究院是践行教育研究的全球智库，总部设于北京，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均设有分站。研究院设有专业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和特约顾问委员，连通政策管理、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等多方视角，通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研究分站，携手教育研究员针对高校战略与管理、学科与科研建设、学生培养等教育主题，进行严肃的调研和科学的分析，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范式，活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提炼形成研究结论和观点。

方略研究院曾参与多项国务院、科技部、教育部、教育厅、国内外高校及高中的教育研究课题与咨询项目，对全球教师人事制度、全球招生与评价、全国高校中外交流合作项目、全球和一带一路教育智库评价等进行专题研究，提交内参专报曾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有关负责人等领导的批示、采纳。

方略研究院旗下拥有专注于教育的研究性媒体“一读 EDU”为代表的媒体矩阵，通过提交内参文件、发布研究报告和榜单、参与承担课题和项目、组织行业活动和专业会议、提供专题策划和宣传报道等多种形式持续发声。同时，依托自身的数据、技术优势，方略研究院还为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组织等提供双一流、国际化、人才培养、教育质量保障等主题的线上、线下解决方案，为教育研究和教育决策者提供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应用的研究支持；协助教育决策从战略到战术的落地执行；加强对教育决策从制定到执行的有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的开放式智库共建和协同合作。

## ● 联系我们

如希望获取报告、进一步了解方略研究院业务或对研究课题、产品及其他业务有合作意向, 欢迎发送邮件到邮箱:  
research@squareedu.com进行洽谈

研究院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液晶大楼

邮编 100084

研究院北京总部电话:

010-6278-8710